

峥嵘岁月

邮电人物篇

o Youdian Renwupian



两位老红军副局长

——忆叶志堂、贺子明

魏恩鸿 杨本财

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时期,有两位老红军副局长。

叶志堂,1917年出生于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由于家境贫苦,没读过书,13岁就参加了革命。他受党教育多年,党性很强,作风很过硬,在艰苦工作面前,身先士卒,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记得当年省局每年都组织参加松花江筑堤工程,总能见到叶局长矫健的身影。1965年,哈尔滨三棵树铁路跨线桥竣工后,市政府号召机关人员参加义务劳动,清理施工现场。那次叶局长带领机关人员参加劳动。他那时已50多岁,穿着背心,和大家一起搬运材料,两米多长的枕木他扛起来就走,一上午都没见他休息过。中午食堂来送饭,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围在车前争先恐后地领份儿饭。只见叶局长乐呵呵地坐在道牙子上,慢条斯理的点燃一支烟,有滋有味抽了起来,等大家都吃上饭了,才站起身来去领份儿饭。

叶局长关怀职工。1963年省邮电科研所解散,魏恩鸿被分配到省局电信处,当时他很想到市局生产第一线。于是跟白局长谈了想法,白局长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但你要征求一下主管局长意见。”次日他找到叶局长。听了魏恩鸿的叙述,叶局长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还是希望你留下来,在工作安排上尽量让你多接触技术工作。”见老局长如此诚意,魏恩鸿也不好再坚持了,于是在电信处负责全省机线设备大修理,经常到各市县局检查指导工作。记得魏恩鸿调入省局第一次探亲,叶局长知道后,亲自下到菜窖给他装了满满一旅行袋土豆,对他说:“东北的土豆白皮、个儿大、好吃,关里没有,捎上给家里人尝尝。”

叶局长不仅对职工友善,也关心职工家属及子女。有一次他见到魏恩

鸿爱人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孩子正发烧,他连忙吩咐妻子过来帮忙,他妻子抱过孩子向车库跑去,叶局长派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大夫说再晚一点儿孩子就烧坏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有一次魏恩鸿陪叶局长去绥化地区检查工作,住在县委小招待所。吃饭定量,每人交4两粮票,1个馒头1碗粥。叶局长把粥喝完了就不再吃了,把他的馒头推到魏恩鸿跟前说:“你还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相互推让了一番,叶局长坐到一边喝茶去了。魏恩鸿最后吃了叶局长的馒头,感念了叶局长60年。

据原省局副总工程师吕鸿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修建北京至莫斯科国际线路,叶志堂担任东北区段总指挥,始终奋战在施工现场。中苏国际电路开通后,他被任命为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分管电信。他是省委组织部直管干部,有资历,有功劳,但不居功自傲,对过去的功绩从来不讲。他为人谦虚、作风正派、生活简朴、对党忠诚、两袖清风、安然而去,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

有一次,叶志堂去几十公里外的大赵家收讯台处理事情,当时派了一辆摩托车送叶局长,半路上叶局长从车上摔了下来,额头被碰破了一块。驾驶员提议返回市里去医院治伤,叶局长坚决不同意,驾驶员只好把他送到收讯台,完成任务之后才到医院检查处置伤口。因伤口处理不及时而留下了后遗症,一到夏天或阴雨天伤口处就发痒。开会或汇报工作时,经常看到叶局长用手挠伤口。

1956年的一天,勤务员打扫叶局长办公室时,发现茶几白布帘下面有500元钱,以为是叶局长放的,就拿给了叶局长,但叶局长说不是他的钱。问这两天都谁来过办公室,勤务员想了想说基建科孙工来找过你,叶局长听后说:“知道了,这件事不要和别人讲。”其实叶局长已怀疑是孙工干的(孙工是日伪留用人员中唯一的工程师)。基建科领导找孙工谈话,开始他不承认,后经叶局长耐心帮助,最后才承认,对自己的错误做了反省。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不仅没给孙工处分,叶局长还鼓励他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孙工受到了深刻教育。

省局另一位老红军贺子明,1931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72年调黑龙江省电信局任副局长。贺子明为人忠厚、朴实,认真负责,执行政策一丝不苟。大约是1974年,省局在佳木斯开全省电

信业务工作会议,因主管电信的叶局长有事没到会,叶局长委托贺子明参会并作会议总结。原计划一个多小时的总结,贺局长讲了两个多小时。当讲到工作困难时,他说:“再困难还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困难吗?”他越讲越激动,干脆把外衣脱了,讲了许多长征的故事。会后大家说:“这次会议既是业务会,也是宣传长征、学习长征精神的会。”

记忆里的白局长

张书栋

在我的心目中,白景文局长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资格老,在抗日烽火中参加了革命,曾任八路军 120 师机务组组长、晋绥军区电台组长,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为民族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四平电报电话局局长、哈尔滨市电报电话局副局长、沈阳市电报电话局局长、松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特别是白局长长期主政黑龙江邮电(31 年),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廉洁奉公,为人正直,为推动邮电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虽离世多年,但白局长高尚的品格和情操,高超的领导艺术至今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白局长施激将法 县局申办全省会

1981 年初,省局在哈尔滨友谊宫召开全省邮电工作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全省邮电企业部署了企业整顿工作。会议期间,白局长召集 20 个县局长开座谈会。他说:“你们都是基础比较好的县局,要通过



整顿改变企业面貌,为全省示范引领、创造经验。哪个局整顿抓得好、有成

1966 年双河支局全体职工。前排右二为首任支局长田长华,左二为第三任支局长王存林,左一为第二任支局长陈德志,右三为本文作者。后排右一为省劳模张桂兰,左二为省劳模陈德学

效,省局就在哪个局开经验交流会。”白局长激发起了与会者的热情。

我那时年轻气盛,除重点整顿支局和生产班组外,集中力量改善局容局貌,美化生产环境。企业整顿告一段落,我给合江地区局打报告,请他们来检查。又过了一段时间,省局政治部主任贾文廷来勃利看了一周,最后说“勃利局基础管理一直很好,尤其是农村乡邮管理过硬,坚持‘五固定’(定班期、定路线、定投递点、定时间、定人员),被百姓誉为‘钢铁班期’。现在又有新发展,积累了新经验,全省会议就在勃利召开,希望你们办好会议。”

1981年8月21日至9月2日,全省农村邮电工作会议在勃利县召开,各地市县邮电局局长参加会议。会上,总结了全省农村邮电工作经验,提出了加强农村邮电工作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任务。滕树人副局长主持会议,白局长作工作报告。

白局长在基层

双河支局是全省老典型,支局长是田长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执行制度严细认真、一丝不苟,敢抓、敢管、敢负责,贯彻上级要求从不走样,多次被评为省邮电系统劳模。继任支局长陈德志、王存林继承了田长华的光荣传统,



本文作者(右)与副局长刘相云研究工作

推动支局管理再上新台阶。双河支局乡邮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对用户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没有变,“五固定”丝毫不动摇,被电子里的乡亲们唤作“铁脚板”“活钟点”,看到乡邮员来了,他们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勃利会议期间,组织代表参观双河支局,我和张童麟陪同白局长乘坐212吉普车(县政府借用)赴双河,他一路兴致勃勃,不时问我勃利县地理环境、农业生产、农村改革、农民收入情况。他还说:“这次农村改革,肯定会有一个大变化,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会大大提高。”到双河支局,白局

长看得很仔细,和老支局长田长华谈,和职工们谈,嘱咐第三任支局长王存林发扬光荣传统,为全省农村支局标准化建设积极探索。白局长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1963年我就来这里总结双河经验,今天又来双河,做的是同样一件事。你们搞的农村支局标准化管理,为全省创造了经验,我感谢大家。”白局长握着田长华的手说:“你有功啊,你精心创造的严细认真的双河经验,至今还管用。”

会议期间,白局长还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县局在刘相云任用上一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白局长召集人事处、办公室和勃利县局新老领导开座谈会。多数人认为他具备条件,但也有人说他骄傲。白局长问:“怎么个骄傲法?”回答说:“好争论。”白局长说:“好争论不是骄傲啊。”不久刘相云就走上了勃利副局长岗位。

培养使用年轻人

勃利会议后不几天,我接到省局通知,让我到邮电部干校学习,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上部干校?”对方答复:“这是白局长定的。”我去了河北定兴县故城邮电部干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来白局长提议我到大庆邮电局工作。1982年3月,在全省邮电工作会议期间,白局长找我谈话,传达了党组的决定。1983年6月,白局长跟人事处说:“小张没学历,应送他去专职学习。”之后我考入了省委党校培训班,两年后取得了大专学历。

白局长非常重视人才选拔任用。王明方在省邮电学校期间,品学兼优,留校任团委副书记。白局长发现他是个好苗子。1976年,王明方担任了省局工业处副处长,年仅24岁。为进一步培养他,派他到哈尔滨市内电话局任副局长,他写出了《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专著,产生很大影响。1983年,王明方担任了省局政治部主任。后来调邮电部,1995年后去安徽,先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政协主席,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何英群1954年上海交大毕业来黑龙江,虽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但受父亲历史问题影响,始终没得到重用。改革开放后,父亲摘了“帽”,何英群已年过40,在邮电科研所工作,没有行政级别。1981年4月,何英群被提拔为科研所总工程师,1985年任省局总工程师。在研究何英群任用问题时,白局长说:“老何不要爬楼梯了(一级一级地提拔),要马上用起来。”走上技术领

导岗位何英群，恰逢中国电信事业大发展，积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改造黑龙江传统电信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官清廉

1981年底，省局给玉泉电缆厂下达了10万元利润指标，厂领导班子有畏难情绪，就向白局长汇报电缆厂的困难和问题，结论是完不成。白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空气就有些凝重，厂领导有些发怵，不知道白局长是啥态度。等了一会儿，白局长不紧不慢地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回去马上召开一次全厂职工大会，谁能让这个厂明年完成利润计划，就让他当厂长！”电缆厂领导好一阵才缓过神儿来，厂长连声说：“我们现在就回去开会。”白局长后来对省局的人说：“玉泉电缆厂的困难被厂领导给放大了，问题就出在领导班子身上，如果他们不转变，是不能继续干下去了。”第二天，玉泉电缆厂领导班子向白局明确表态：“已连夜开会研究了，制定了增收节支措施，明年盈利指标可以完成。”

20世纪80年代初，哈尔滨市长途电信局、市内电话局分设。省局投资改造长途电信局通信设施，需要将市内电话局设备科迁走，可电话局不同意，省局几次协调都没结果。问题摆上了白局长案头。白局长找来市话局领导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打仗，必须拆掉一座桥，否则这一仗没有胜算。你们说这桥该拆不该拆？”市话局领导听得直愣神儿，不知如何回答。白局长接着说：“拆桥和保桥，拆桥是全局，保桥是局部，谁主谁次，谁先谁后，你们能分出来。至于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提出来研究解决。”白局长处理问题举重若轻、直奔主题、不绕弯子，一个棘手问题解决了。

白局长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几个孩子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不搞特殊化。他有一个侄子在北京中央军委仪仗队，复员后来哈尔滨，他没给安排工作。经济困难时期，下边的同志送点儿豆油，他都如数付款。

我和白局长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冬天。在道外的一间修脚室，我刚进屋，白局长就被搀扶着走了进来，帕金森病使他全身抖动。我急忙上前扶白局长坐下，之后给老局长脱袜子洗脚。修完脚，又帮助穿上。第二年开春，白局长就去世了，在白局长家，我看见室内满是鲜花。他家人对我说：“白局长生前喜欢菊花，就让菊花陪伴白局长一路同行吧。”

情牵大别山

——随父亲叶志堂回乡记

叶三强

我父亲叶志堂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通信老兵。1931年5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25军通讯班班长、中央军委三局电话队排长。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攻克锦州,父亲奉命接管锦州市电信局,随后任辽西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父亲任东北区邮电管理局工程总队队长,承担战时国内通信保障任务。1954年调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顾问直到退休。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从事通信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

1977年,父亲退居二线,带着母亲和我回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县,探望阔别多年的老首长、老战友。路过北京时,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张总编和夫人来看望父亲。他对母亲说:“我刚参加工作就在老局长手下了,他生活上照顾我,工作上重用我,运动中保护我。我必须请老局长吃顿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父亲一直很关心职工生活和疾苦。记得有一次我在三棵树邮电防腐厂遇到一位老工人,他说你父亲可是好人,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我家生活困难找到你爸,你爸热情接



父亲叶志堂在新县老家

待我,帮我老伴安排了工作,我这辈子忘不了。60年代,省局车库王师傅遇到困难,鼓起勇气向父亲借钱,父亲不管家里开支,叫我大姐赶紧把攒的钱都拿出来,大姐噘着嘴,极不情愿地把20元钱交给王师傅,此后父亲再也没问过还钱的事。

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红军时期是父亲的老排长,还是父亲的老乡。当时李伯伯家住电报大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请我们一家去做客,没有大鱼大肉,没有山珍海味,只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席间两位老战友回忆红军时期的艰苦岁月,延安时期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做好通信保障的逸闻趣事。1945年承德第一次解放,李伯伯带领父亲接管承德市电话局,当时我母亲15岁,是话务员。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时,八路军主动撤出了承德,父亲动员工人参军,李伯伯夫人苦口婆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要她与部队一起撤退。双目失明的姥爷得知母亲要走,死活不同意,拄着拐棍跟随部队几十里要劝母亲回家,母亲含泪与姥爷告别,随大部队向辽西挺进,在解放东北的征途上,父母结成了革命伴侣。

新县位于信阳市东南部,交通不便。我们到信阳后又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才来到这个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大别山的中心地带。鄂豫皖苏区有200万人参军,有近100万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不足10万人口的新县就牺牲了5万多人,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有丰碑。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考察调研,第一站到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告慰在天英灵。

到达新县,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刘明榜与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他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白沙关“万人暴动”,曾任中共扶县(即新县)中心县委书记和红军游击队队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指示一定要找到刘明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河南省监委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是20世纪50年代电影《五更寒》中刘拐子的人物原型。刘书记与父亲白天走访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军烈属,寻访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晚上彻夜长谈。刘书记将父亲带到附近的山坡上说:“要扩大烈士纪念馆规模,在这建一座革命烈士陵园,让大别山革命精神世代代传下去。”令人欣慰的是,刘书记的愿望实现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扩建后,1989年8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刘书记年纪大了,几天的奔波有些吃不消,他安排乡武装部部长陪同父亲踏上大别山崎岖的山路,看望已故战友的亲属、老乡亲友。山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家家门口都挂着一块破旧的烈属牌。父亲让母亲留下一些钱物。父亲的舅舅是位在乡老红军,因负伤被安置在老乡家,从此与红军失去联系,家境十分贫寒。父亲雇人从很远的地方买来一块猪肉,拾来缝纫机,找裁缝给舅爷做了一身衣服。舅爷80多岁了,穿上了新衣服,全村人坐在一起吃上一顿有肉的菜,舅爷高兴得合不拢嘴。在老家土门村,父亲给爷爷奶奶扫墓,晚上与乡亲们坐在一起点着油灯唠家常、剥花生。当年爷爷参加红军牺牲后,乡苏维埃主席刘明榜将还是儿童团员的父亲送去当红军。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父亲将奶奶托付给乡亲,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了延安。是乡亲们照顾奶奶,为奶奶送的终。父亲得知老乡叶志来吃野蘑菇中毒去世,家中留下老婆和3个孩子,几年后叶志来的长子长大一些,父亲将他接到哈尔滨打工并帮他成了家。

父亲与母亲约定百年之后,要回到大别山。2017年,我们兄弟姐妹将父母安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让父母在大别山红色土地上安息,让他们看着大别山上的红旗永远飘扬。



父亲在大别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写在离别时刻

——怀念滕树人局长

张童麟

2019年5月8日,原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滕树人与世长辞,终年86岁。虽然滕局长年事已高,又多病缠身,但对那些爱戴他的老邮电人来说,他的离世还是让人极悲切、极不舍。

2019年春节期间,滕局长因胃出血住院后病情不断加重,经常处于肝昏迷状态。但在“五一”节前后的一段时间,却有了极大好转。节日那天我特意买了鲜花去家里探望,想让他感受到与常人一样的过节气氛。那天滕局长很兴奋,与前几日判若两人,在一个多小时里一直和我讨论几天前我和明海写的关于评价他的那段文字。没想到仅仅一周之后,这段文字竟在他老人家的告别仪式上诵读了。

历史使命

那是在4月初,医院几次下达滕局长病危通知,我们不得不开始准备后事。我和明海回顾并概括滕局长几十年职业生涯,写了段文字发在微信老邮电群里:

“滕树人同志主政黑龙江邮电,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身体力行,走出局门,走向社会,活跃在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政部门之间,成功争取到全社会对邮电发展的理解和支持。在1985年到1993年,省政府三次召开全省通信建设会议,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推动我省邮电大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较短时间内我省建成光缆、模拟和数字微波、小同轴电缆干线,引进程控交换设备,在全国各省区第六个达到百万门交换容量,实现了历史性大跨越。在此基础上,1994年全省实现了交

换程控化和传输数字化。

滕树人同志对黑龙江邮电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了一代邮电人,在实现通信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转折阶段的历史使命。”

当时,滕局长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这段文字,

勉强支撑着给我打了个电话:“别说过头了,工作是大家干的,咱们一辈子不张扬,别到最后说过了。”我心里一阵凄楚,唉!这就是滕局长,一辈子自悟自省,一辈子内敛自律。

滕局长的这个电话引发我和明海的深入思索,我们虽只是民间舆论,但对滕局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是否准确?是否恰当?当然,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滕局长个人的,也是针对那一代老邮电人的。

我们思索的结果是,滕局长在黑龙江邮电摆脱落后向现代化转折的关键时期,在面临着邮电发展从过去的自力更生转向动员、引领、依靠全社会共同发展邮电通信的转变;面临着从为党政军服务转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的市场方向的转变。在这种方向、路线、策略的转变中,又首先面临着我们邮电人观念和历史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滕局长以他的睿智和认知,以他的敏锐和行动力,成功领导我们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这就是他的最大的历史功绩。

在“五一”谈话中,我在纸上写了“历史使命”4个大字给滕局长看,他会心地笑了。几十年来,我和滕局长有一种很深的默契,我写的东西和他讲的话,彼此一般不需多解释。他有些激动地回忆起那时在全社会,特别是到省、地、市、县领导中去宣传、去说服、去呼吁共同发展邮电通信的往事。滕局长叹息道:“我们省不仅落后,而且比其他省更困难,一级干线只有80公里,哈尔滨对地、市、县扇面辐射,都是省内干线,要是不能落实‘四个一起上’,我们永无出头之日。那些年我们上东部微波,上西部小同轴,上北部数字微波,后来又上光缆,都是我们和省政府出一块,地、市、县再出一块,邮电



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旧址

部再给补一点,邮电大发展就是这样搞起来了。”滕局长说完,沉寂了好一会儿,凝视着天花板,眼睛愈来愈亮……他好像在追寻那如火如荼的大发展岁月,追寻那运筹帷幄,邮电发展风生水起、捷报频传的年代。我不住地点头,静静望着他,一滴泪珠沿着他的眼角皱纹缓缓流下。

滕局长说的那段历史我很了解。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电话交换机容量只有16万门,电话用户为10万户,电话主线普及率仅为0.33%,而当时世界电话平均普及率为13.5%,非洲地区都在5%左右。长途通信交换以人工接续为主,由于国家一级干线只路过



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滕树人(1991年)

双城到哈尔滨,省内二级干线以架空明线为主,长途通信能力落后于全国。

我省邮电条件比其他省差,但却在通信大发展转折时期,走到了全国大多数省的前面。在滕局长离任的1993年,全省邮电业务收入增幅达到60%,超过了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究其深层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当年滕局长对历史使命的认知更充分,对角色的转变更自觉,对转变后的角色更投入。以滕局长为旗帜的那一代黑龙江邮电人,出色完成了历史使命。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有人说就两点,是否能够充分认知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否能够充分践行自己的历史责任。

责任驱动

滕局长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参加什么娱乐活动,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这也是当年老邮电人的共同特点。面对转折时代,滕局长深悟不能停留在过去陈旧的发展思路和轨道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趋使他迅速转换自身角色,把局长转变为邮电首席外交官、首席市场营销官。他把工作重点由内部转向外部,走出局门,走向社会,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奔走斡旋,奋

力为邮电发展鼓与呼。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辞辛苦,不计较得失,不在乎什么排场体面。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落实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滕局长走访各地、市、县,拜会地方官员,既为宣传发展邮电通信,更是当面感谢地、市、县领导的支持,为基层邮电企业营造好的工作环境。那次在密山县,县长很忙,约晚上一起吃饭交流。可约定时间到了只来个县政府巡视员,县长临时去市里了。当时我觉得很不自在,这是冷落呀。可滕局长毫不在意,对巡视员说:“没关系,地方官很忙,我就向你汇报一下就好,然后你们再研究,看我们如何一起解决这些问题。”那位巡视员急忙说:“哪里哪里,滕局长您是来指导我们工作的,听您指示。”寒暄过后,滕局长非常认真地与他分析和研究落实建设资金的问题。饭后这位巡视员对县邮电局局长说,邮电不愧是老国企,领导素质真是好。第二天,我就接到县邮电局局长的电话,说县长找他去办公室,表示要马上召开县政府工作会议,专题研究落实滕局长来密山的工作要求。后来密山政策支持幅度很大,发展在县级城市中一直处于上游水平。

滕局长本来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可为了这份责任,他让自己的智商情商都发挥到最佳。1988年,孙魁文上任省计委主任,滕局长立即让我陪同他以老乡身份前去拜访。原来滕局长在牡丹江市邮电局任副局长时,孙魁文曾在牡丹江市委任职。在孙主



滕树人局长20世纪80年代视察邮电企业

任办公室门前,我们等了10多分钟。孙主任见面后连声说:“让老领导久等了,对不起、对不起。”滕局长十分客气地说:“孙主任,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们省邮电太落后了,国家没能力制造足够的通信设备,现在允许我们进口,但外汇指标太少了,请你帮忙调剂一些支持我们。”孙主任一边点头一边说:“我知道了,老领导你亲自出马,我会尽全力帮助解决。”孙主任接着说:“老领导,以后有事让您手下来就行了,不用您亲自跑。我来哈尔滨本该去看您

的。”滕局长忙说：“你工作比我忙，我来是应该的。”接着滕局长拿出一个小礼品送给孙主任：“这是我出国用自己的钱买的小礼品，表达我的谢意。”十几分钟的等待，十几分钟的会面，滕局长表达了我们的诉求，也让人感觉到邮电干部对政府官员的尊重与理解。在那些年，我随滕局长不论是去见部长、见省长，还是见厅局长、处长，他都热切真诚，温文尔雅，他每每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每每都能打动人心的，都是他对邮电发展的那份强烈企盼，他对邮电事业的珍爱与热情。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

视野与睿智

我跟随滕局长工作十几年，在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理解问题的高度敏锐。在通信大发展起步阶段，滕局长对借用社会新闻宣传力量来扩大邮电发展的影响，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布局。首先，他把这项职能没有放在宣传处，而是放在了对发展邮电有更多政策了解，对社会各行各业有更多了解，对邮电内部有更多措施了解的办公室。对外宣传的重点不是放在企业内典型、好人好事等方面，而是放在邮电通信与社会各行各业的关系上，放在邮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的社会应用上，放在邮电企业为发展通信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上。当时滕局长特批16万元购买了先进的电视摄像设备，后来又配备了编辑器，还配了专车。经过积极运作，我们先后成立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电视台3大邮电记者站。滕局长经常亲自为新闻宣传定重点，重要的稿件，特别是涉及省领导对邮电发展的言论和措施的稿件，他都亲自把关修改。

在工作中，滕局长处处表现出统筹全局，善处轻重缓急的领导力，对事关重大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具有独到的判断和果断行动。1987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使通信完全中断，滕局长看到新闻播报后立即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这场扑火救灾正需要我们的通信恢复，我们马上开会，然后我直接带人上去。”我劝道：“让电信处或主管领导带队去就行吧。”滕局长不容分辩地说：“我要去，不仅是电信处、邮政处，计划处，财务处都上去！”我立即跟省政府联系。省政府答复，省长刚开了紧急会议，没有找你们，去大兴安岭的火车票也都分发下去了，你们过几天再去吧。我向滕局长汇报后，滕局长说：“省政府没找我们，是他们不完全了解恢复通信的关

键作用,可我们应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坐邮车上去。”第二天,滕局长带着电信处处长、邮政处处长和办公室秘书,挤在装满邮袋的车厢里,奔向了救灾第一线。

当滕局长出现在扑火前线总指挥部,沈阳军区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大为感动,这是厅局



滕树人局长在哈尔滨长途通信枢纽工程奠基仪式上讲话

领导中第一个赶到火场的。在几十天抢险救灾中滕局长和邮电干部职工的出色表现,在全省上下赢得极高声誉。邮电部通令嘉奖黑龙江,请滕局长带队赴京为部机关干部和管理学院作报告,并颁发了奖金。那次火灾人员死伤及财产损失极其严重,有些部委受到批评。由于滕局长第一时间亲赴火场迅速恢复通信,国务院对邮电部表示满意。

宅心仁厚

我在省局度过了12个春秋,而1989年那个年三十的下午却让我念念难忘。那天,我在办公室接到机要通信员小周电话,他急促而带着低泣说,“主任你能来我家一趟吗,我家玻璃让我弟弟给砸了,这年没法过了……”我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家庭冲突,连说:“好的,我马上过去。”小周家位于香坊,一条土路凸凹不平盖着黑乎乎的雪和冰,小周和他父亲在一片破旧的平房前等我。老周是哈尔滨市邮局的老职工,他拉着我满面愁容地介绍他的这个家。这是邮局职工宿舍,当年分给老周一间平房。他有两个儿子,小周是老大,前几年结婚没处住,就在院里的煤棚子加砌土坯墙,又盘了土炕做婚房。院子很狭小,一棵树就直接围建进房子里了,斜亘在火炕的一侧。我问小周:“这炕怎么睡呀?”小周说:“只能斜着躺,一躺就是几年了。”我的心头一紧。老周接着说,原本以为省局机关比基层企业条件好,大儿子结婚会很快分到住房。可是一等几年过去了,现在小儿子要等这房子结婚。今天小

儿子发邪火,把玻璃给砸了。老周有些哽咽,不知是气还是怨。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这屋子走出来的,回到办公室垂头丧气。恰巧滕局长从门前走过,看到我问了句:“怎么不回家过年?”滕局长整整长我20岁,经常拿我当孩子,也容得下我常常耍小脾气。“过什么年,有什么好过的!”我没好气地说。滕局长见



1990年,滕树人局长与邮电部部长杨泰芳亲切交谈

我情绪不对,进屋坐到对面,半开玩笑地问:“怎么了,谁惹的?”我突然觉得,我这火气不是正应该发到这位黑龙江邮电最高长官身上吗?于是我一股脑把去小周家的事说出来。“滕局长,老周小周两代邮电人,日子却是这样艰难凄苦,我们真的没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吗?我们几次分房解决特困户,可这么困难却没人管?”滕局长只是听着,脸色越来越严肃。我有些后悔说得太多。突然,滕局长说了句:“要车,我去小周家看看。”我连忙说:“滕局长,我不是抱怨您,不必了吧,过了年再说吧。”“不,我应该去看看,这能让他们先好好过个年。”我睁大眼睛看着局长,更加后悔向他发泄了这么多的怨气。

我第二次来到小周家,老周拉着滕局长的手一再道歉:“对不起呀局长,大过年的把您惊动起来。”滕局长动情地说:“老周啊,是我该给你道歉呀,你们生活的这样子我还不知道。你们工作艰苦,生活也这样艰苦,我有责任呀。”一席话说得老周热泪盈眶。滕局长一边看着两间破屋,一边对老周说:“你先好好过年,我一定尽快帮你解决困难。”

回来的路上,滕局长说:“你协调工会、行政处,调查有多少这样的困难职工,拿出个解决方案,过完年先定一批。还要让省邮电工会也搞一个调查,写出报告上会讨论。”此后,省局机关工会组织了特困户分房,小周和十几个年轻人都解决了住房急需。

3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那个年三十,想起那时老邮电职工的艰苦生活,想起那些含辛茹苦却从无抱怨的老邮电人,想起那时对员工有着真实实

感的老邮电领导。

最后一段文字

“滕树人同志对党忠诚,为人厚重。他是创造黑龙江邮电大发展历史的奠基人;他是充满激情,充满智慧的卓越领导者和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他是两袖清风,淡泊名利,宅心仁厚的慈祥老人。

一段历史,一座丰碑。黑龙江邮电人永远不会忘记!黑龙江邮电人将永远从中汲取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

屈指算来,我和明海为滕局长当秘书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这次是我们写给滕局长最后的文字,也是滕局长一生看到的最后一段文字。虽已天人永隔,但我们愿意相信这写在离别时刻的文字,会成为他不灭灵魂的慰藉和永恒的陪伴。而滕局长给我们留下的一切,也会激励和引领我们不断追寻老邮电的足迹,去不断挖掘老邮电精神财富的宝藏。

日月可鉴是丹心

——记孙纯玉先生

孙明海

2017年6月16日,孙纯玉在牡丹江逝世。他的离世没引起一丝微澜,但如果回溯到40多年前,曾经响彻中国的“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己动手变面貌”的时代声音,孙纯玉是引吭者。他和延寿县邮电局一度站在了中国通信业舞台的中央。孙纯玉的求索之路,孙纯玉的奋斗经历,给予艰难跋涉中的邮电从业者引来一缕希望之光。30多年前,我在省校读书时,在省报看到了孙纯玉的长篇事迹报道,由衷钦佩他。30多年后,受邮电老同志委托,我筹划写纪念孙纯玉的文章。一件件褪色的遗物,一份份尘封的档案,一次次访谈,努力去融入那段历史,了解那个时代,再现黑土地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初心:把一切献给党

1959年,孙纯玉17岁,在邮电局上班的父亲因工伤离世,家庭陷入困境。党组织妥善安排了全家的生活,并决定把品学兼优的孙纯玉送到牡丹江邮电学校学习。3年后,他揣着优秀的成绩单来延寿邮电局当了机务员。

孙纯玉酷爱技术革新,他看到磁石交换机用户手摇呼叫,铃音大,震耳欲聋,话务班的姐妹苦不堪言,就做了一个音量限幅器安在电路上。话务座席塞绳断了,报告机务来修理,耽误生产,影响收入。孙纯玉用1块电池、1个小灯泡做了告警装置,塞绳连接不好灯泡就闪烁,就可提前换好塞绳。小改小革、小有收获,大家对这个小青年刮目相看了。

1964年那会儿县委开电话会议,公社没有增音机,只能1个人用耳机子听,而且音量小。孙纯玉研制了话筒前置放大器,大大改善了会议质量。20

世纪60年代,延寿邮电局的设备大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4部百门磁石交换机,还有3部国产长途磁石交换机,县至公社只有10条电路,通信能力极度紧张。孙纯玉用转电线圈搞了个装置,在县局至六团公社铁线上增开了一条双幻电路,暂时解决了问题。后来六团公社双幻电路总出故障,汪书记问孙纯玉怎么办?他提出造载波机,开载波电路。这时载波机在延寿还只是个概念,谁都没见过。孙纯玉边学边干,画出了载波机电路图。1968年,延寿邮电史上开通了第一条县至公社的载波电路。

1969年3月,延寿战备形势严峻,对通信需求极为迫切,可当时县到各公社只有1对铁线,县广播站每天早晚定时占线广播,其间不能打电话,对外联络中断,遇到急事很麻烦。孙纯玉去安徽、江西学习,回到延寿就开始研制广播载波机。县局职工齐上阵,做了340个



孙纯玉在测试广播载波机

载波机骨架。测试载波机群放大器需要示波器,可买1台要2000多元,孙纯玉跑到哈尔滨花5块钱买了只旧示波管,动手装了简易示波器。晶体管参数人工测试效率低、不准确,他用1个旧表头做了个测试器,1分钱没花,测得又快又准。半年后8个公社实现了载波化,县至公社电路由10路增加到18路。

拓荒:豁出命也要甩掉落后帽子

1965年,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说:“邮电通信是一条落后的神经,落后了20年,要赶上去。”孙纯玉知道,守着一堆日伪遗留烂摊子,拼着命地维护,也只能是维持,靠维持实线变不成载波,“摇把子”变不成“自动机”。磁石不淘汰,不可能让党政机关和人民满意。1971年,孙纯玉向党组织提出了研制晶体管交换机的想法。我们不能等,也等不起!我们不能“等、靠、要”,而要“干、闯、造”。延寿县委和邮电局都非常支持孙纯玉。

一个小局自造交换机,有些天方夜谭。机械室3个人连电路图都看不太懂。但有心人孙纯玉从1963年起就默默地做着技术储备。他修好了省局调拨的破旧D2单路载波机,安装了晶体管无线电收发报机,无线电步谈机,小型晶体管电话携带机,电子防空、防盗警报器,电子定时器和电视接收机。对半导体元器件特性、电路原理有了深入了解。



孙纯玉(左二)与同事设计载波机

那时邮电部门十分困难,缺资金、缺材料、缺工具。总设计师孙纯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走路想着电

路,躺在坑上也想着电路,有了灵感就往纸上画,找不到纸就往墙上画,弄得满墙都是道道。妻子疑惑地看着他说:“你不要命了?”孙纯玉回答:“不豁出命不行!”入冬了,孙纯玉家的墙裂着口子,棚也没糊,屋里屋外一样冷。老书记带人抹好墙糊了棚。制作印刷电路板需要专用设备,可延寿局啥也没有,那就土法上马。没有照相设备,他们就直接在铜箔上印刷,结果不是图案不齐就是线条模糊。到印刷厂请教,摸到了门路。电路板投入硫酸槽,有用的部分也被腐蚀掉了,原因是腐蚀药物配比不合理,于是就夜以继日地试,经过2 000多次失败,终于做出了合格电路板。调测时发现交换机呼叫用户不振铃,放下听筒却响铃。孙纯玉带领大家实验了几十次仍不得其解。最后发现问题出在电子器件质量上,运用脉冲双稳态电路解决了问题。难关被一个个攻克了,1972年,晶体管交换机诞生了,“摇把子”成了历史。

1973年,孙纯玉把目标锁定在造全自动电话交换机,100门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攻关小组成立了。没有离心机,他们找个破信箱,借了1台电机改装而成。没有恒温箱,在保险柜里加些电热装置代替。没有防酸腐蚀槽,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做成硫酸容器。清除电路板铜箔氧化层,需要去污粉,他们舍不得买,就用柴草灰过滤后代替。从电业管理站要来废旧高压汞灯做电路板曝光光源,紫外线把职工的眼睛灼得刺痛。1974年,100门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研制成功,加信乡成为全省首个自动电话乡。邮电部部长

钟夫翔、副部长申光去加信乡调研,拨打了准电子交换机,连夜听取孙纯玉汇报,对此赞不绝口。

党组织起初想让孙纯玉去北京邮电学院深造,因工作脱离不开而取消。后经部长钟夫翔批准,抽调武汉研究院的李晓江等人,起早贪黑地给他讲授电子电路、无线电、交换机专业课程。一般需几年才能学完的课程,他凭借非



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左一)、延寿县委书记张玉柯(左二)、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白景文(左三)视察延寿邮电工作。右一为延寿邮电局话务员刘玉珍

凡的记忆力、极强的理解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1年不到全掌握了。他说这下子可省劲儿多了。他设计的交换机接续方式更加合理,运用学到的理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交换机防雷击问题。

求索:邮电通信现代化之路

1975年,延寿局组织职工大讨论,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延寿局子小,小打小闹,造出百门准电子就行了。另一种意见是600门,上2端4路载波机,埋设农村地下电缆,搞邮政自动取包机。要站就往高处站,要看就往远处看,要干就大干,要变就大变,缩手缩脚学不了大庆,慢慢腾腾变不了面貌。最后决定三步并作两步走,两年汗水一年流。1975年4月,600门准电子、3个百门准电子交换机,20端3路载波机,8座席无塞绳长途电话交换机项目同时启动,攻坚战开始了。

组装600门准电子交换机需10多万只电子元器件,5000多块印刷电路板,20多万米导线,60多万个焊点。印刷电路板去污工艺,原来人工刷洗,5分钟处理1块板,供不上焊接需要。李春思用旧电机带动几个毛刷给电路板去污,1分钟处理1块板子。腐蚀印刷电路板,处理一块板半小时,投入十几个人也干不过来。有个职工用气泵往腐蚀槽里吹气,让腐蚀液翻滚起来,加

大摩擦力,提高工效100多倍。财务人员算了一笔账,交换机所有电路板外委加工需4万多元。以前在机柜上开孔安仪表,先用手摇钻打一圈小眼,再用锉刀掏大眼,费时费力,还不美观。有人把旧车刀装



延寿县邮电局组织职工会战制造600门准电子自动电话交换机

在钻台上,做成“开孔器”,完美解决了问题。按技术规范,笛簧管启动电路应采用耐高压大功率硅管,但这种器材不好买,就用锗管代替,功能等效,又节省资金。起初,孙纯玉对程序控制电路、译码电路、可控硅触发电路心里没底,为积累经验,做了1台邮政自动取包机,取得电子器件特性参数。孙纯玉发现1块完工的电路板上二极管不合格,当即决定对未焊接的2000多个二极管全部重新测试。在会战日子里,延寿局3人工作2人干,抽出1人搞会战。8小时内拼命干,8小时外做贡献。大家疲乏至极,困得睁不开眼,就冷水泼头,清醒了再干。家属生病了也不回家,青年职工推迟婚期。市话班“铁人式好工人”穆广福,5人抽4人会战,他1人承担全班工作,生病发高烧,领导准他回家休息。他说这点儿病算个啥,出身汗就好了。孙纯玉已连续干了几通宵,一天深夜,老书记汪志平强制他回家休息。孙纯玉踏进家门,发现妻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3个孩子趴在炕上哇哇呕吐,煤气中毒了。爱人和孩子抢救过来了,天也亮了,孙纯玉又返回了会战现场。1975年,600门准电子交换机开通投产。

10年苦战,延寿局制造了400门晶体管共电交换机,3部百门准电子交换机,1部600门准电子交换机,20端3路载波机,8座席无塞绳长途交换机。还制造了半导体会议电话增音机38台,电话会议汇接机2部,广播载波机17台,以及配电盘、测试仪器等。日伪时期的旧设备全部淘汰,县至公社的电路比1966年前增加了5倍,60%的公社对县城实现半自动拨号。邮电业务收入从1969年的不到10万元,提高到1981年的34.6万元。

1977年8月,全国邮电部门第二次学大庆第一阶段会议在牡丹江召开,第二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学大庆、赶延寿、超牡丹江,努力实现全国邮电通信现代化”的目标。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大会主

席团成员,钟部长向中央领导介绍了孙纯玉。孙纯玉应邀到邮电部科研院介绍了技术攻关经验。

邮电部提出今后3年奋斗目标:基本建成省会、工业城市之间的4个业务通信网,即长途电话交换自动网、传真通信网、数据通信网和电报自动转报网;基

本实现县以上城市电话自动化、县到公社电路载波化、县以上城市电报传真化。黑龙江省局提出到1985年,省会到地市电路平均达到60~120条,实现长途交换全自动拨号,在哈齐牡佳等城市采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省会每5户1台电话,其他地市每10户1台电话。



孙纯玉在调测600门准电子自动交换机

修身:淡泊寡欲 恭俭为先

孙纯玉十几年扑在钟爱的事业上,获得了党和人民的褒奖,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省、地、县劳动模范,1978年获全省劳动英雄称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这些奖励是精神层面的,孙纯玉依然过着简朴甚至清贫的生活。他在名利前表现出的好人本色、党员本色,至今熠熠闪光。

1974年之前,孙纯玉已担任延寿局副局长,一家5口租住十几平方米的土坯房。局长孟宪清请示省局,白景文局长批了5000元给孙纯玉盖房子,不料孙纯玉拒绝了。他说:“我是党员,工作上可以带头,生活却不能特殊。”老孟说你是副局长了,房子应该改善一下。孙纯玉说那更不行。孙纯玉建议孟局长再给省局打报告,多要点儿钱,多盖点儿房,给技术骨干也解决一下。省局最后批了4万元,建10套宿舍。老孟原想给孙纯玉建46平方米的房子,其余宿舍为35平方米。孙纯玉不同意,说自己不能搞特殊。无奈改设计,全是35平方米。宿舍竣工后大家让他先选房,孙纯玉坚持最后选。

孟宪清是优秀的基层干部,将党的温暖输送给了孙纯玉和他的战友们,当技术骨干乔迁后,就转化成了他们创新发展的动力。据省局老干部吕鸿

声回忆,1977年钟部长出国访问,要孙纯玉随行,当时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一年四季穿着破旧工装,没有手表。组织上给他置办了新衣服,35岁的孙纯玉第一次戴上了手表。

1976年4月,孙纯玉被任命为省局副局长,他没跟组织提任何要求,继续住在简陋房子里,继续拿着原来的工资,到省局开完会立即返回延寿上班。1980年他辞去省局副局长,到牡丹江邮电局担任了副总工程师。

孙纯玉是春蚕,是蜡烛,是孺子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当年孙纯玉提出的“四不”原则,深刻表达了他对邮电事业的赤诚之心:凡自己能做的,就不买;凡能挖潜的,也不买;凡能修旧利废,就不买新的;凡性能相同有价格低的,就不买贵的。焊接机柜的角铁需除锈,孙纯玉不舍得用砂纸,而是顶着烈日在沙堆里摩擦除锈。

孙纯玉所处的是邮电落后保守的时代,也是邮电从业者自强不息、艰难探索、奋力拓荒的时代。历史时针飞转,技术日新月异,孙纯玉时代及后世的电信技术现在大多已进入博物馆。但孙纯玉的精神却不会引因岁月流逝而湮灭。

明鉴琴心 方正人生

——忆明方兄

张童麟

2016年9月16日,在安徽省政协主席任上的王明方不幸离世,这让许多黑龙江邮电老友悲恸不已。几年来,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写些怀念明方兄的文字,可每当触碰那些回忆便心有刺痛,泪眼婆娑中,几次提笔,几次放下。

我和明方结识于1980年,那时我在哈尔滨市内电话局做办公室秘书,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派明方来任副局长。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是省局后备干部,来电话局任职是为获得电信现业企业管理经验和经历。

最初见到明方,感觉他浑身上下都透着朴实,明亮微凸的双眼满是真诚。他总是面带笑容,无论是遇到干部还是工人都会主动热情招呼,毫无一个年轻后备干部的盛气。我当时认为他就是那种难得的少年老成。

思想——为年轻插上翅膀

我和明方在电话局相处时间并不长,因为半年后我调省局办公室当秘书去了。然而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交流却非常多,无论是电话局的经营管理,还是效益效率,无论是邮电系统的种种痼疾,还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时弊都是我们的话题。我的性格与明方相反,有些锋芒外露,也很“愤青”。那时我们的交流方式往往是我把所有的看法想法倾倒给他,而他多是平静地听我述说、听我牢骚,只是涉及一些重要观点时才扼要校正一下我的看法。等到他积累了一些想与我讨论问题时,我们就会下班后推着自行车从道里走到南岗(那时他住在文化宫宿舍,我住在巴陵街),这一路多是他在说,我时

不时地对他的观点表明态度,也对他对我的规劝表示感谢。在越来越多的交流中,我渐渐地发现和体会到他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思维方法,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往往比较客观,很少情绪化。

在邮电系统上上下下都公认为方爱学习,但我发现他不仅爱学习,更善于思考,很愿意钻研,也很注重应用。他在长邮高等函授学习中,对高等数学中的数理逻辑特别感兴趣,经常和同窗热烈讨论数理逻辑的奥妙,这对他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颇有帮助。明方在讨论研究问题时不愿意就事论事,而总是从一些表面现象中



发现内在、深层的东西,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后来我把这归结为明方的“哲学思维”,这在当时的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这一点在他撰写的《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一书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2012年的安徽省政协主席王明方,他曾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写这本书时,明方年届三十,但他的思维深邃,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应用程度达到了很高水准。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理论说教,而是应用系统论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社会发展大系统中进行分析,然后再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系统进行狭义系统论的分析和认识,弄清系统中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变化和相互作用,以建立系统作用大于因素之和的认知。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就容易看清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和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引导、调整、建立人们健康的精神生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且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它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层次、结点去认识,去组织,去发挥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作用,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去达到思想工作的效果。这被明方称之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性。这本书标志着明方当时哲学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2年,王明方(前排左四)来黑龙江访问交流时,与曾经共同工作过的邮电老同志合影,前排右四为本文作者

2012年,明方已出任安徽省政协主席,受黑龙江政协主席邀请来黑龙江交流访问。当时他的新著《道与法》还未正式出版,但已经有了样本。我看到这个书的名字时有些不解,我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太大太重,会不会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他对我解释说:“这个道,说到底就是客观规律,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而法是我们所寻求的认识和运用规律的思想方法,我是在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点着头,着实心有所悟。明方这一生一直在探寻他要寻找的那种思想方法,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思想方法就是思想路线,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能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和各种复杂的环境下获得正确认知和判断,做出正确的决定。掌握了这样的思想方法就有了人生和事业的金钥匙。应该说,明方是掌握了这个金钥匙的人。

本色——让人生扎实的基石

明方的一生是本书,而书中最凝重的两个字就是——本色。明方从基层干起官至正省,无论在黑龙江还是全国邮电都堪称人中翘楚。但实际上,明方对官阶职级并不敏感,他的为官之道是只做官不谋官。有一次在聊天时我祝贺他晋升省委副书记,明方则笑着给我讲了个故事:“那年我还没到

20岁,龙江农村的支部书记告诉我,决定让我做小队会计,当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反复下着决心,这辈子我一定要把这个会计做好。”明方看着对我说:“你看我的抱负有多大。”我也笑了,心想,这就是本色,无论是做小队会计还是当省领导,本色让明方这一生的仕途扎实,按着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吧。

2012年的一天,明方去北京开会,我们约好在北京见面。当时黑龙江邮电的一些老领导时刻关注着明方,经常给明方打电话,有时还把电话打到省委值班室询问情况。明方和我说:“你回去向老领导们汇报一下,我肯定不会出问题。我不跑官不要官,也容不得跑官谋官的人,任何人送我的任何礼金礼品都会引起我的反感。”明方接着说:“我做副书记,管辖的副厅以上干部有上千人,这的确是一个高危的位置,稍不留神就会被贿赂包围。所以我防微杜渐,刻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品牌,你送我任何东西我都不会接受,哪怕是一支钢笔。我会对送钢笔的人说,我管这么多干部,每人送一支笔,我们家的笔就会成堆;有人过年送一盆花,我也要让他拿走,我说我们家如果每人送一盆花,是要摆不下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牌,一个不近人情的品牌,一些人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都很打怵,会考虑给我送任何东西都是不行的,是适得其反的。所以我敢打包票,谁出问题我都不会出问题。”明方说的我很理解,因为他的超脱来自他的朴实,他的淡泊名利来自于他的本色。

明方自幼丧父,在母亲的拉扯下长大,生活的艰辛让他学会坚强也学会敬畏,用老话说叫敬畏皇天后土,按照当今该说敬畏党性民心。几十年来明方尽管步步高升,一路顺畅,但他从不失自我约束,从不放松自我管控,从不张狂,从无傲慢。一个人从本色起步易,而能一生本色不改难。这本色,让明方的一生一尘不染,一生纯粹而高尚。

大爱齐家 大道无形

2016年9月,我去安徽与明方作最后告别,见到明方的爱人朱晓楠,不觉又悲从中来。晓楠多年不见已显苍老,遭此劫难更是满脸悲伤。我木讷地听晓楠讲述明方的最后时光,心扑扑乱跳,一阵阵收紧,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担心晓楠扛不住这致命的打击。直到一个月后,看到李焕清转来晓楠回忆明方的文章,才松下一口气。